



1405-2005
郑和下西洋600周年

〔明〕马欢 原著
万明 校注

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



海军出版社

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

(明) 马 欢 原著

万 明 校 注

海洋出版社

2005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 (明) 马欢原著: 万明校注. -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05. 7

ISBN 7 - 5027 - 6378 - 3

I. 明… II. ①马…②万… III. 瀛涯胜览—注释 IV. K9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2728 号

责任编辑 刘义杰

责任印刷 严国晋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9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50.00 元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
献给

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

1405—2005

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



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
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

二〇〇五年七月

三寶征夷集

余昔觀島夷誌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慨然嘆普天之
下何若是之不同耶未樂拾壹年癸巳

太宗文皇帝勅命正使太監鄭和等統領寶船往西洋諸番開讀賞賜余
以通譯番書忝備使末隨其所至鯨波浩渺不知其幾千里萬歷涉
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誌之所著
不誣而尤有不可奇詫者焉於採撫諸國人物之妍強壤俗之同
異與夫土產之別量域之制編次成帙名曰瀛涯勝覽俾屬目者一
顧之頃諸番事實悉得其要而尤見夫

聖化所及非前代之比弟愧愚昧一介微氓叨陪使節與斯勝覽誠千載之

瀛涯勝覽序

余昔觀島夷志載天時氣候之別地里人物之異慨然嘆曰普天之下何若是之不
同焉永樂癸巳

太宗文皇帝

勅命正使太監鄭和等統領寶船往西洋諸番
開讀賞賜余以通譯番書叨備使未隨其所至
鯨波浩渺莫知其幾千萬里歷涉諸邦其
天時氣候地里人物然後知夫信如島夷

志之所著而尤有大可奇怪者於是采摭
各國人物之醜美壤俗之異殊與夫土產
之別疆域之制編次成帙名曰瀛涯勝覽
俾屬目者於一頃之頃諸番事實悉得其
要而尤見夫

聖朝治化所及實非前代之可比也自愧愚昧
一介微氓辛陪使節與斯勝覽誠千載之
下一奇遇焉顧早失經訓才學荒疎措意
遣詞不能文飾但直書其事而已君子觀



瀛涯勝覽一卷

(明)馬歡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祁氏淡生堂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瀛涯勝覽

一卷》提要

瀛涯勝覽序

金吾龍圖黃武天時氣候之外地也
然嗟嗟天下何若是之不同也永樂
太宗文皇帝初使正使太監鄭和統
諸番國諸寶船全以通譯番書泰西
諸國諸洲不知其幾千萬里歷涉諸
人物日擊而身親之然後知品貴誌之
而尤有可大奇說者焉於是揀諸國
人物之異同與夫土產之別編次成
曰瀛涯勝覽偶偶者一顧之內諸事
而見夫望化所及非前代比第愧然
一微紙叨
詔不報文飾但直言其事而已覽者
永樂丙申歲中月會楊山恒馬歡述

史 255-223

淡生堂本

瀛涯勝覽序

予昔觀島夷誌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
慨然歎曰何普天之下若是之不同哉逮求樂癸巳
太宗皇帝勅正使太監鄭和等領寶船往西洋諸番
開讀賞賜予以通譯番書亦備使末隨其所至但見
鯨波浩渺而莫知其幾千萬里於是歷覽諸邦悉知
天時氣候地理人物誠有如島夷誌之所載而尤有
大可怪者遂因各國人物風俗之殊疆域土產之別
採摭編次成帙名曰瀛涯勝覽俾觀者一覽之頃而
諸番事實悉得其要蓋可以見



瀛涯勝覽目錄

卷之上	占城國	爪哇國
舊港國	暹羅國	
滿刺加國	啞魯國	
蘇門答剌國	南淳里國	
卷之下	錫蘭國	小葛蘭國
柯枝國	古里國	
溜山國	祖法兒國	

聖朝治化所及寶
叨陪使節得與
往來才學覽
後之君子幸毋以鄙吝而見哂可也
大明永樂丙申黃鍾月吉日會錄山樵馬歡序

马欢《瀛涯胜览》源流考

——四种明钞本校勘记（代前言）

万 明

一、引言：意义与问题所在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初年一大盛事，也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航海活动。“其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然也”。^①然而，下西洋档案没有完整保留下来，郑和本身又没有著述，今人所见下西洋原始资料中最重要的一部，即马欢《瀛涯胜览》。

马欢，字宗道，自号会稽山樵，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以通晓阿拉伯语，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宣德六年（1431年），以通事身份三次（第四次、第六次、第七次）跟随郑和下西洋，访问过亚非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回国后整理撰写了《瀛涯胜览》。他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第一次随郑和下西洋回国即草成初稿，最后在景泰二年（1451年）形成定稿。《瀛涯胜览》，“瀛”，是大海之义；“涯”，指天涯海角，是水边的意思；“胜”是风景胜地；“览”是游览。顾名思义，就是海外游记。古人认识世界是以赤县神州为九州，其外有“大瀛海”^②，马欢以此题名，意在让更多世人了解下西洋的盛事，描述世人鲜知的海外世界。他的这部海外记录，具有丰富内涵。在他以前，从宋代以来，对海外的记录多为传闻，即使是元代《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他所记有听之传闻的成分，不可能在两次出洋就跑了那么多地方。

① 朱当泗编：《国朝典故·瀛涯胜览·马敬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

② 《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附《邹衍》，中华书局，1992年。

马欢的书是他切实踏勘的结果，是亲历者的实录。这就使“异闻”脱去了虚幻，使海外成为一种现实。

现存郑和下西洋三部基本文献，包括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都是当时跟随下西洋的人所著。其中，马欢《瀛涯胜览》一书，出自亲历下西洋的通事（即翻译）之手，更具原始资料性质，弥足珍贵。费信书所记诸国，凡并见于马欢书者，其明确及其重要皆不及《瀛涯胜览》；不见于马欢书之处，大多脱胎于汪大渊《岛夷志略》。巩珍书与马欢书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书前自序直言转述通事之言，实际上有价值的只是书序与敕书三通。因此，马欢《瀛涯胜览》是三部基本文献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此书久已蜚声中外，不仅是明代一系列有关中外关系记载、清修《明史·外国传》的史料渊薮，也是古代中外交往史上影响最大的史籍之一，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英文和日文都已有译本。1978年，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Ali）教授在给季羨林先生的信中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①由此可见此书学术价值之一斑。

从原始资料出发研究，才能对历史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作为原始资料，郑和下西洋研究的深入，离不开对于《瀛涯胜览》的利用与研究，因此，对《瀛涯胜览》成书及其版本的整理和探讨，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基础工作；其中对版本流变的了解，可以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下西洋的原貌。近年郑和下西洋研究在国际上趋热，然而，大部分人的研究满足于成型的资料汇编，少有研究者对于基本文献加以整理、考证和研究，以致社会上仍很不了解郑和下西洋的三部基本文献。作为基本文献却受到冷落，这是不正常的。忽视了基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将影响学术研究的水准和公正评价。

早在19世纪末，1895年英国学者菲力普斯（G. Phillips, 1836 ~ 1896）开始对《瀛涯胜览》作了章节译注，^②介绍此书到西方世界。

① 季羨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37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② G. Phillips: Mahuan's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Bengal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xxvii, 1895, London.

1929 年向达（觉明，1900 ~ 1966）《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一文^①，对《瀛涯胜览》作了版本考证和详细介绍。1933 年荷兰学者戴文达（J. J. L. Duyvendak, 1889 ~ 1954）发表了《马欢再考》^②，其后不久，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 1878 ~ 1945）一篇洋洋大观的书评刊于同年《通报》上^③，这就是 1935 年冯承钧（子衡，1887 ~ 1946）翻译出版的《郑和下西洋考》一书^④，此书有专节论述《瀛涯胜览》，与上述向达的文章一样，是对《瀛涯胜览》研究奠定基础的力作。冯承钧在《序》中评价外国学者的研究，指出“但是寻究史源勘对版本的，只有伯希和一人”。^⑤伯希和研究了当时所见《瀛涯胜览》的各种版本，并且分析说明了各本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对《瀛涯胜览》版本的复杂情况有了一定认识。他未见《纪录汇编》本外的别一写本，将《瀛涯胜览》版本区分为两大系统，一是马欢原本，一是张昇改订本。此后，这种分类认识一直为中外学术界所认同，并延用至今。冯承钧在译出《郑和下西洋考》后不久，就主要依据伯希和所见明刻《纪录汇编》本与清刻《胜朝遗事》本，参考向达提示的明钞《国朝典故》本若干异文，为《瀛涯胜览》作了校注，出版了《瀛涯胜览校注》一书（下面简称《校注》）^⑥，这是对郑和下西洋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这一校注本成为《瀛涯胜览》通行本，迄今已经 70 年了。

值得提到的是，冯先生在《校注》之后，又有《校明钞本瀛涯胜览》。^⑦其《序》中言：

二十三年夏译《郑和下西洋考》毕，想乘伯希和教授热锅里再烙一张饼，所以接着辑了一本《瀛涯胜览校注》。当时搜辑之本很

① 向达（觉明）：《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小说月报》20 卷 1 号，1929 年。

② J. J. L. Duyvendak: Ma Huan Re - examined, Amsterdam: Noord - Hollandsche uitgeverij, 1933.

③ P. Pelliot: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T'oung Pao, vol. xxx, 1933.

④ [法] 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商务印书馆，1935 年。

⑤ 冯承钧：《郑和下西洋考·序》，第 5 页。

⑥ 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5 年。

⑦ 冯承钧：《校明钞本瀛涯胜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丝栏钞本。

多,可惜《国朝典故》本得之较晚,仅摘录其异文若干条。《校注》本付梓后,获见明钞《说集》本,比较《国朝典故》本更为详晰,诸番国名后录有下西洋的宝船人数,为他本所无。于是又在二十五年冬至二十六年春间,取《说集》本同《国朝典故》本对校。我的目的同张畀等不同,他们尚雅洁,所以将原本删润;我则取其芜俚,归震川《星槎胜览》云“当时所记虽不文,亦不失真”,盖本斯意。现以《说集》本为底本,用《国朝典故》本对校。所谓朱本,即指《国朝典故》本,因为从前见过《四库总目提要》,有一条说《明朝典故》是宗室某所辑,惟《明史》九七《艺文志》有邓士龙《国朝典故》一百卷,是否同书,尚待考证云。^①

《序》文所署日期是“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即1941年1月5日。

以明钞《说集》本作为底本,用明钞《国朝典故》本对校,冯承钧开了明钞本校勘的先河。但可惜他以“取其芜俚”为指导思想,以文字多、晚于《国朝典故》本的《说集》本为底本,这样的校法无法查考出源流,结果也恰是如此。

此后,日本学者小川博、英国学者米尔斯(J. V. G. Mills)的译本为研究做出了贡献。1969年《瀛涯胜览》有了日文译本^②,1970年有了英文译本^③,这两个译本都是《校注》的译本,沿着原有的思路,对于版本源流基本上没有研究推进,即没有更多的版本开掘。

追溯学术史,马欢《瀛涯胜览》的整理与考订主要有两次,一次是上个世纪30年代冯承钧集中西学者研究成果,出版的《瀛涯胜览校注》;一次是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对《瀛涯胜览校注》的译注,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学者米尔斯译本,集中了西方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巧合的是,冯承钧《校注》出版于1935年,米尔斯译注本出版于1970年,相距35年,而今,距米尔斯译本出版又是一个35年了。

① 冯承钧:《校明钞本瀛涯胜览·序》。

② [日]小川博译注:《瀛涯勝覽》,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年;《中国人の南方見聞録——瀛涯勝覽》,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年。后者是前者的增订本。

③ J. V. G. Mills: Ma Huan Ying-y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143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70.

正如伯希和依据马欢《序》所断言，1416年马欢在他第一次随郑和下西洋（即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归后，撰成此书，其后续有所增。^①而他所断言“此书的源流本来已经错杂不明”，实是确论。^②经过后人的误会，就更加错综复杂了。一般说来，人们所熟知的是《纪录汇编》刻本，这是沈节甫、陈于陛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编辑付梓的一个丛书本（同一丛书，也收有署名张昇的《瀛涯胜览集》）。冯承钧《校注》所根据的底本就是明刻《纪录汇编》本，他参考和汇集了中外学者如向达、伯希和等人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胜朝遗事》本对《纪录汇编》本进行了校勘。《胜朝遗事》是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吴弥光辑刻的一部丛书，因此可以说《校注》主要是以晚清刻本校勘的。当时情况如上述《校明钞本瀛涯胜览·序》所言，明钞《国朝典故》本“得之较晚”，所以仅摘录其异文若干条而成。而主要以晚清刻本来校明本，是在当时所见版本局限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做法。伯希和早已指出：《胜朝遗事》本虽不本于《纪录汇编》本，存在不少好的异文，“但经文人改窜之处，更较《纪录汇编》本为甚”。^③这次校勘，笔者更深刻地体会了这一点。试举柯枝国一例说明：钞本见“国人有五等……五等人名木瓜，木瓜者，至低贱之人也……其木瓜之业，专以渔樵、抬负重物为生，官不容他穿长衣经商买卖，如中国傣人一般”。《纪录汇编》本文字不清，《校注》依据清刻《胜朝遗事》本，改为“官不容穿长衣，其经商买卖与中国汉人一般”。这样一来，意思相反，完全错了。原因很简单，清刻本距原本年代已有400多年，时间愈久，辗转愈多，讹误也愈多，因此，在掌握更多明代版本的情况下，实有必要排除清刻本，重新校勘。换言之，对于明钞本《瀛涯胜览》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仍然摆在我们面前。

20世纪80年代初，邱克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三宝征夷集》本，著文说明宝船尺寸的可靠性^④，其中沿着伯希和的思路，将《瀛涯胜览》大致分为删节本和足本两个版本系统。没有区别钞本和刻本，也没有注意

① 《郑和下西洋考》第23~24页。

② 《郑和下西洋考》第15页。

③ 《郑和下西洋考》第17页。

④ 邱克：《谈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寸的可靠性》，《文史哲》1984年第3期。

梳理源流的问题。80年代末宋立民《瀛涯胜览版本考》一文^①，所见版本仍没有区别钞本、刻本，从单个版本角度谈及价值，不论时间先后顺序进行介绍，对版本的源流没有足够的了解。90年代初邱炫煜《郑和下西洋〈三书〉考释》^②对三部基本文献进行了综合考证研究，依据《国朝典故》本马敬《序》，提出疑正统九年（1444年）已有钞本传世，但对马欢原书系统的考察，却仍仅谈及了明钞《国朝典故》本、明刻《纪录汇编》本、清刻《胜朝遗事》本。

如上所述，关于《瀛涯胜览》的版本，以往划分为两大系统：一是马欢原本系统，二是张昇改编本系统，马欢原本系统似乎只有一个源流。这样一来，钞本成为研究的空白。其实，这是由于所见版本的局限。原本和改编本两系统下应有分支，各自可分为钞本和刻本两部分，还可依年代和版本分为明钞和清钞、明刻和清刻。在传播过程中，《瀛涯胜览》一书在明前期主要依靠钞本流传，钞本有可能比刻本更接近原本；发展到明后期，虽然印刷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钞本仍然作为书籍流传的一个重要途径，明人还是颇重手本的，故珍本还是有不少是钞本。以往主要是所见局限，所以学界一般认为马欢书只有一个源流，缺乏关于钞本系统和钞本与刻本的谱系关系，以及钞本流传的研究，这说明马欢《瀛涯胜览》钞本的整理和流传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展开。

对马欢《瀛涯胜览》版本的了解，尤其是下西洋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其文字增补部分对于研究将产生重要的不可替代作用。这就要求对版本做全面、系统的研究，也就必须从校勘重新开始。目前，我们已经有条件见到四种明钞本《瀛涯胜览》，以此进行校勘工作，探讨《瀛涯胜览》的版本流变也就具备了前提条件。各本互有短长，可以起到互补作用。现在应该脱离以往校勘的思路，以四种明钞本为主互校，参校明刻本和其他明代史籍，不用清刻本，以期考察源流，恢复接近原本的本来面貌，得到新的认识，推进研究。此外，此书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不可或缺、经常被引用的资料，但事实是以往的校注本已是70年前的，我

① 宋立民：《瀛涯胜览版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第2期。

② 邱炫煜：《郑和下西洋〈三书〉考释》，《国立编译馆馆刊》第20卷，第2期。此文承台北成功大学郑永常教授快寄赠予，在此谨致谢忱。

们今天应该在前人所取得的成绩上继续努力，出一本新校勘本，以便利现代读者，使更多读者读到这一宝贵的历史记录。

出于上述考虑，笔者搜集到现存四种明钞本《瀛涯胜览》：即朱当泗编《国朝典故》本（以下简称国本）^①、佚名辑《说集》本（以下简称说本）^②、祁承燦淡生堂钞本（以下简称淡本）^③、天一阁《三宝征夷集》本（以下简称三宝本）^④，先以国本，后以三宝本为底本加以校勘，试图以此方式梳理马欢《瀛涯胜览》的版本源流。在校勘工作接近尾声时，意外又发现了第五种明钞本，即梅纯辑《艺海汇函》本（以下简称艺本），这是百年来研究者从未发现和提及的，为马欢《瀛涯胜览》的源流又增加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并且解决了近百年对于《瀛涯胜览》作者和初刻本及其时间等问题的学术积案。

下面的探讨，着意于原本系统源流的梳理，兼及改编本；而在原本系统中，又以明钞本的探讨为主，兼及明刻本，旨在探讨《瀛涯胜览》一书的源流及其流传轨迹。

二、《国朝典故》本——马欢初稿本

校勘第一阶段，选中的底本是《国朝典故》本。

校勘之初，为探讨马欢《瀛涯胜览》的原貌，主要是在现存明钞本中寻找最接近马欢原本的本子，以开展四种明钞本的对勘工作。

《国朝典故》一一〇卷，是明宗室朱当泗所编辑的一部丛书，这套丛书收有明初至嘉靖年间史籍六十三种，为明钞本，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应该说明的是，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两种朱当泗编《国朝典故》明钞本，一种佚名编《国朝典故》明钞本，均存有《瀛涯胜览》。两种朱当泗编《国朝典故》，一为三十册，半页九行，行十八或二十余字，蓝格白

① 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向达首先发现和介绍。

② 今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冯承钧首先发现并用于校勘。

③ 清修《四库全书》时，《瀛涯胜览》仅收入了存目，且误作者为马观。近人编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卷255收入福建图书馆藏明祁氏淡生堂钞本《瀛涯胜览》。

④ 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邱克首先发现。

口，四周双边，存六十一种，一〇三卷。此本存留最多，但无序言；另一为二十四册，半页十行，行二十字，蓝格白口，四周双边，存四十一一种，八十四卷。此本有朱氏序言，但存留不及上本，且乱简多，目录与篇中卷数不同，次第零乱。佚名编《国朝典故》，十册，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蓝格白口，四周双边，存二十二种，四十二卷。此本阙失太多，虽保留有《瀛涯胜览》，但初校以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异文。三种本子中，今以一〇三卷本为主，并参校了其他两本。

朱当泗，号望洋子，是鲁宗室钜野王朱泰澄之孙，明封将军。康熙《袁州府志》云：“钜野诸宗，多尚文雅，最著名者曰将军当泗，博览群书，蓄书甚富。购得异本，手自抄录不下万卷。尤攻墨妙，发为诗文，甚别雅。”^①

从丛书前《序》，可以洞察朱当泗抄录和编辑这套丛书的动机：

予俾栖宗藩，雅耽竹素，远称羲轩辟天之始，近稽皇祖开国之迹，叨沐遗谟，激衷兴思而感仰殊深。然左史记言，右史记行，其秘诸史馆，藏之奎幽者，固不可得而易见；然遗笈散帙，纪载多门，漫无统纪，罔便阅历。予乃搜猎曲存，较讎鱼亥，第其伦次，萃其涣而会其统，遂因各家之成书，类而聚之，其重者不删，各存其说。上自祖宗创守之艰难，中及臣工私录之闻见，下迨僭窃夷狄之叛服，靡不毕具，使开卷便瞩，用资博识之士。^②

此《序》作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因此，可以断定丛书成于此年。而钞本必是抄于此前或当年。在时间上，此本相对它本占了先。

第一阶段选取的底本是国本。那么为什么选中它呢？伯希和曾以“番名佔”、“尸头蛮”之例，判断国本是马欢原本钞本，或者是更接近原本的钞本。^③通过初校，完全可以认定伯氏所见正确。从朱氏编辑大套丛书的宗旨来看，即再现大明功业的原貌。因此，他需要保存文献原貌，这一点也恰与校勘要寻找最接近原本的本子的目的相合。从伯氏当年未见的国本《序》中，我们确知它的抄录时间是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

① 康熙《袁州府志》卷三〇《封建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② 朱当泗编：《国朝典故·序》，此据八十四卷本，一百三卷本无序文。

③ 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拾遗》，《郑和下西洋考》第165～166页。